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俄】П.М.斯卡奇科夫 著

【俄】В.С.米亚斯尼科夫 编

柳若梅 译

白春仁 外文校订

汤开建 中文校订

俄罗斯汉学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俄罗斯汉学史

【俄】П. Е. 斯卡奇科夫 著

【俄】В. С. 米亚斯尼科夫 编

柳若梅 译

白春仁 外文校订 汤开建 中文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汉学史/(俄罗斯)斯卡奇科夫著;(俄罗斯)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9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5097-1846-9

I. ①俄… II. ①斯… ②米… ③柳… III. ①汉学-历史-俄罗斯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1421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俄罗斯汉学史

著 者/[俄]П. Е. 斯卡奇科夫
编 者/[俄]B. C. 米亚斯尼科夫
译 者/柳若梅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责任编辑/刘 丹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崔雪梅
项目统筹/宋月华 范 迎 责任印制/岳 阳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40mm 1/32 印 张/20.875
版 次/2011年9月第1版 字 数/517千字
印 次/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1846-9
著作权合同/图字01-2011-3209号
登 记 号
定 价/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 1911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

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



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

——俄罗斯汉学史

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这本书能以你们的母语出版，我很高兴。此书讲的是俄罗斯怎样逐渐了解你们这个伟大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那些来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不止一两年的俄罗斯人，如何学习中国的语言，着迷于中国文化，努力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传达给自己的民族。这正是汉学的主要作用：拉近民族间的距离，努力帮助他们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对方的传统、习俗。在当代，这已成为我们两国的国策——2006 年定为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 年定为俄罗斯的中国年。然而在遥远的过去，却需要付出很多艰辛、耐心和毅力，才逐步使我们两个国家和人民达成相互理解。300 年，这是俄国汉学已走过的历史岁月，其间俄国汉学家为了俄罗斯了解中国，也为了中国了解俄罗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您手中这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我的导师彼得·叶梅利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去世后为我留下了这部书的手稿，他曾不得不把初稿压缩了几近一半。我花了 10 年的时间准备手稿的出版，力求全面恢复手稿原貌，以此回报恩师。然而正如中国的《易经·系辞上》中所说，“书不尽言，言不

尽意”。这部书稿有一个特点，它是开启俄国汉学档案资源的一把钥匙，俄国的档案资料蕴藏着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这部书稿为进一步发展学术、进行新的探索、寻找新的发现打开了一扇窗户。

П. Е. 斯卡奇科夫那一代人，是以俄罗斯和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审视祖国的命运变迁的，这样进入了革命年代。这一代人承担的责任，是把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东西传递给能够理解其真正价值的后继者，俄罗斯文明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巍然屹立，他们经受了国内战争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那场毫无道理的大清洗运动。

我的导师是怎样的人呢？1949 年夏天，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使命的时候，П. Е. 斯卡奇科夫正被流放，住在西伯利亚离小城坎斯克不远的塔谢耶夫镇。

塔谢耶夫镇是他 1949 年 1 月 25 日第二次被捕后的服刑地，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于 1937 ~ 1946 年间他曾先被关在监狱，后来又被押送到科累姆的集中营。在塔谢耶夫镇，П. Е. 斯卡奇科夫在区里的集体农庄学校工作，教会计课，后来又在塔谢耶夫木材采运企业供应处当统计。他家的部分成员（妻子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女儿玛丽娜和亚历山德拉）后来得以在这里团聚。直到 1954 年，П. Е. 斯卡奇科夫一直在塔谢耶夫镇继续增补他那部著名的《中国书目》，与列宁图书馆通信，并构思关于伟大的汉学家比丘林的电影剧本。精神世界强大有力，是他们这一代俄罗斯同胞的突出特点，他们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的大清洗中都经历了非人的磨难。

在集中营能活下来——这是很严酷的考验，为了生存下去并保持精神力量，需要有远大的目标，使环境不致摧毁自己的品格。

1956 年彻底平反之后，П. Е. 斯卡奇科夫回到了列宁格勒，他依旧乐观、开朗、善于交际，坦诚待人。他为自己制定了特殊的工作和休息规则，先一气不停地工作两三周，然后找个地方去户外写生，回来后再开始紧张的工作，如饥似渴地希望能够完成那些大的



课题。那还是在他和家人遭遇悲剧之前就计划好了的，虽经多年令人绝望的不公和非人的折磨，他仍没有放弃。而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珍藏的俄罗斯和外国古典音乐，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放松。

是П. Е. 斯卡奇科夫一家难能可贵的精神力量，帮他顶住磨难并支撑了下来，重新找到自我并进行学术工作。在他的家庭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相互间忘我的忠诚不渝，尽管表面看来总是戏谑笑闹、互相揶揄。

不过这些还都是彰显于外的性格特点，其内在核心却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工作中形成的。现在，П. Е. 斯卡奇科夫家里还珍藏着他的一些回忆录，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为父亲写了小传。我们以他的家庭档案为基础，已能了解到П. Е. 斯卡奇科夫优异品格形成的主要时期。

从童年起，П. Е. 斯卡奇科夫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对旅行很感兴趣，读了大量旅行方面的书籍。但他只到过伏尔加河沿岸和克里米亚，不过想象中他走遍了全球，甚至“走遍了”日本和中国。

1911年中学（彼得堡商业学校）毕业后（他在这所学校学了英语），П. Е. 斯卡奇科夫去服兵役，在诺夫哥罗德省第37炮兵旅作为“志愿兵”服役一年，后因对军队工作不感兴趣，他作为临时聘用人员进入了国家储蓄银行。

1913年，他想去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工作，于是决定学习汉语，并去了解了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实用东方学院的情况。

但他不可能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因为那里是白天上课，而他不能放弃储蓄银行的工作，因为他的工资是全家唯一的收入。实用东方学院同样有汉语课，正好是晚上上课。

1913年春，П. Е. 斯卡奇科夫来到了实用东方学院，他根据入学要求递交了申请入学所需要的一些资料。在准备入学的时候，他开始阅读在大众文化馆里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个文化馆离利戈夫卡街很近，他就是在这条街的一栋楼里出生并一直住在

这里。

在实用东方学院，可以看到和 П. Е. 斯卡奇科夫一样穿着学生服听课的许多人物，其中有在 П. Е. 斯卡奇科夫入学前毕业于汉日专业的鲁多夫（В. Н. Рудов）、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教授和院士。

汉语课准时在 9 月 1 日开始。П. Е. 斯卡奇科夫的第一位汉语老师是斯梅卡洛夫（Г. Ф. Смыкалов）。斯梅卡洛夫 1902 年以一等毕业证书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但家庭情况却不允许他研究学问，他去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工作，后来去了中国，1907 年返回彼得堡后开始教授汉语。

斯梅卡洛夫教汉语语法很有特点，他事先声明，他的教学方法是通过阅读中文报纸让大家从实践中学会语法。的确，他在讲语法时引用大量例句和从中文报纸上摘下来的短文。

第二位老师是教口语的中国人张玉广，他的俄语说得相当好。不知道张先生在中国受过怎样的教育，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是他留给所有学生的印象。

主要的教师是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教授，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伊凤阁于 1902 年大学毕业，留校在汉满语教研室工作，他的几篇关于唐古特手稿的文章特别有名。

伊凤阁在彼得堡的实用汉语教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 世纪初的俄国政府极缺汉语翻译人才，只有海参崴东方学院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毕业生才能胜任，而像伊凤阁这样的高水平汉学家更是奇缺。他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都十分过硬，是与中国有工作关系的俄国政府各部门的重要顾问，名气很大。苏联时期，伊凤阁是外交部的翻译，并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几年。

伊凤阁除了带学生阅读文选外还教授汉语语法。在学生接触了书法之后，伊凤阁用自己在北京发表的教材讲授行书。

除了汉语课，学生还要听领事法课，学中国地理，讲授这些课



程的是斯梅卡洛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8月，П. Е. 斯卡奇科夫作为预备役准尉应征入伍，被派往前线。从1918年底起在红军服役。

直到1920年，当他成为西伯利亚红军某部作战司令部首长，住在鄂木斯克，他才得以短时间地恢复汉语学习。

在鄂木斯克住着很多中国人。П. Е. 斯卡奇科夫从一个中国人手里买了一包香烟，还让这个中国人再往家里送一包。就这样他认识了这个叫范登元的中国人，此后范登元每天晚上去 П. Е. 斯卡奇科夫家里教他汉语。无法判断范登元在汉语方面的学识，不过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他的汉语发音和实用东方学院的口语教师张玉广一样棒。П. Е. 斯卡奇科夫在司令部的工作非常繁忙，晚上回家很晚，有时甚至不回家，所以跟范登元学习也很不规律，不过几近忘记的汉语总算有所恢复。

范登元和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孩子们相处得特别好。他没有家室，孩子们每周去他家两三次，小姑娘们在那跳舞、朗诵诗歌，回家的时候他总是送一些当时很稀缺的糖果。范登元告诉 П. Е. 斯卡奇科夫，孩子们的到来使他家里像过节一样。1920年的4月或5月，这段汉语学习就结束了。

1921年8月，领导推荐 П. Е. 斯卡奇科夫去司令部的学院学习。8月中旬他来到莫斯科，打算进东方系，他已经了解到，那里教授汉语。

见了学院的负责人——П. Е. 斯卡奇科夫在西伯利亚时的上司阿法纳西耶夫（Ф. Афанасьев），阿法纳西耶夫说最近总司令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有令，这一年不招非党学员，学校请他明年再来。可以想见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心情多么沮丧，他想重学汉语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1922年，П. Е. 斯卡奇科夫转业来到彼得堡应用东方语言学院，这是一所半军事化的学校。

1922年9月初的一天，П. Е. 斯卡奇科夫一个人坐在学校的教

室里，他不知道会有哪位教授来授课。铃声响后，一位高大结实的人走进教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他和 П. Е. 斯卡奇科夫谈了起来，问他从哪来，为什么选择汉语，最后阿列克谢耶夫声明：“在没有通过俄语语法考试之前，我不会教您汉语。”接着他阐述了这个要求的目的，并说这个要求是针对他所有学生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已年近三十，在中学毕业 12 年后，他再次拿起了俄语课本。这一次他顺利地通过了阿列克谢耶夫的语法考试，阿列克谢耶夫只给他提了两三个简单的问题。

接下来的第一节课的上课地点是阿列克谢耶夫家——同一座楼再高两层的书房。阿列克谢耶夫告诉 П. Е. 斯卡奇科夫应该用什么词典，建议他读瓦西里耶夫院士的一些书，并要求他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司空图的诗品》一文。直到这一学期结束，П. Е. 斯卡奇科夫是阿列克谢耶夫唯一的学生。

阿列克谢耶夫的第二节课是阅读、翻译《聊斋》，中间穿插讲解汉语的特点，作业是下一次课前独立地翻译一点《聊斋》。尽管 П. Е. 斯卡奇科夫过去跟随伊凤阁学过一年多的汉语，但阿列克谢耶夫所讲的对 П. Е. 斯卡奇科夫来说却是全新的，很吸引人，从此汉语方块字的原文对他来说具有了不可言说的魅力。

阿列克谢耶夫的课每周两三次，每次两小时。教学要求相当严格，П. Е. 斯卡奇科夫得花大量的时间用于课前准备。

在寒假和暑假，阿列克谢耶夫都会布置很多作业——翻译未经点校的汉语文言文。例如 1923 年夏天，他给学生们一本传记文章，让学生任意翻译其中的一篇。П. Е. 斯卡奇科夫选了一篇“中国将军”，开始了绞尽脑汁的翻译历程。秋天作业交了上去，阿列克谢耶夫看罢问道：“我读了您的译文，但不明白——请问是谁打死了谁？”这个问题译者自己也没弄明白。

第二年是读《辞源》，阿列克谢耶夫布置的作业是翻译其中的



几页。

第三年是翻译各类文章，阿列克谢耶夫特别重视成语，翻译和理解成语对于掌握文言文来说非常重要。

1925 年 П. Е. 斯卡奇科夫前往中国，主要是长城以外的北方。

同所有的学生一样，大学时代极为短暂。这一天，列宁格勒实用东方语言学院所有毕业生都得到了“红色东方学者”的证书，每人还得到了一本巴托尔德的《东方研究史》，上面写有学校赠给某某同学的字样，并有巴托尔德的签名。

П. Е. 斯卡奇科夫向外交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去中国工作。在等待了 6 个月之后，派他为驻塔城领事馆秘书的任命才由他的妻子从列宁格勒寄来，而此时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当 П. Е. 斯卡奇科夫在张家口苏联军事顾问队工作后，游遍中国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知道他的两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坐车从张家口到苏联边境，第二次是从北京经华中、华南各城市前往广州。П. Е. 斯卡奇科夫在这一时期开始记日记，但只是简单的几句提纲。但这些记录在我们看来却是极有价值的资料，说明了他与苏联帮助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时值 1925 ~ 1927 年间，中国革命处于高潮，北伐成功，各党派加强了统一战线活动，反动势力则试图进攻共产党，民众力量也参与到与军阀的斗争之中。华北的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军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队就驻在华北。1926 年 11 月，各地军阀在天津召开会议，会上决定组建以张作霖为首的反革命同盟——“安国军”。

1926 年 8 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苏联给予国民革命军以很大帮助，在张家口顾问队参与下制订了培养军官的计划，并确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法。从苏联运来了各种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和飞机。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条件十分复杂和危险。1927 年春，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发起了全线进攻，这段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就是 1927 年 4 月 6 日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袭击。张作霖的军警搜查

抢劫了武官的住所和苏联公民的房间，有很多人被捕。同时被捕并遭受酷刑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和他的一批年轻战友。这一事件 П. Е. 斯卡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专章进行了介绍。

当 П. Е. 斯卡奇科夫从中国回到列宁格勒时，他又与终生爱戴的阿列克谢耶夫见面了。那是 1929 年，在东方学研究所，此时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已经是图书馆馆长，并且正在攻读研究生。1930 年秋，鄂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邀请 П. Е. 斯卡奇科夫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П. Е. 斯卡奇科夫开始与阿列克谢耶夫经常见面、交谈。

每星期一，在东方学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室都要召开全室研究人员和应邀前来的汉学学者的会议。在这样的会上，总会有人作报告，大多数情况下是主持会议的阿列克谢耶夫本人提出报告，讨论中国的新书，并给予详尽的评价。这些书评和报告，开阔了研究所人员的知识面，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引导他们关注思考那些了解尚浅的汉学问题。

除了这种会议外，中国研究室还定期开展“难句讨论会”活动，由把《易经》译成俄语的舒茨基（Ю. К. Шуцкий）发起。在翻译中遇到疑难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问题带到讨论会上。当然，仲裁官常常是阿列克谢耶夫。这些都是对大家有益的高水平的会议。

1956 年 12 月，莫斯科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坐落在中国路上，在条件完备的电站建设部大楼的一层和二层。里面长长的走廊是这座大楼的标志，这是研究人员互相交流的主要场所。大家都十分熟悉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身影，一般每月都会出现两次，像田野上的播种者，穿越这块学术的园地。他从列宁格勒来，带来的不仅是东方学同行的消息，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П. Е. 斯卡奇科夫常常会告诉大家一些图书信息，写在一张张小纸和卡片上，或者是与所里同事的课题相关的材料，“我



找到了点对您有用的资料……”成了他和大家见面时常说的一句话，接着就会拿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卡片。没有卡片或笔记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友好的微笑、善意的玩笑和给年轻人的一点糖果或小礼物。

П. Е. 斯卡奇科夫每次到来，都是所里的一件大事。所里的年轻人（年轻人是这个研究集体的主体）都离不开他，他们被他善良的心地、绝无仅有的中国学识、善于工作和组织别人工作的能力所吸引。“不很年轻的”也对他特别尊敬，他们都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鄂山荫（И. М. Ошанин）、杜曼（Л. И. Думан）、艾德林（Л. З. Эйшлин）（他们分别比 П. Е. 斯卡奇科夫年轻 8 岁、15 岁、18 岁），还有岳特金（Р. В. Вяткин）和从 1959 年起主持研究所工作并也属于“阿列克谢耶夫派”的齐赫文斯基（Б. С. Тихвинский），当时齐赫文斯基刚过 40 岁。

П. Е. 斯卡奇科夫与那些一起经历古拉格集中营地狱般磨难的几个人保持着患难之谊：克雷莫夫（А. Г. Крымов）（即“郭绍棠”——译者注）、杜巴索娃（З. С. Дубасова）、佩尔利（Н. А. Перли）、梅尔纳克斯尼斯（А. И. Мелнакснис）等，还有不在研究所工作但也专注于自己撰著的人，如他最亲近的好友马尔科·伊萨阿科维奇·卡扎宁（Марк Иссакович Казанин）。在他们眼里，П. Е. 斯卡奇科夫是具有良知和高尚品格的人。

1958 年，由 П. Е. 斯卡奇科夫指导和直接参与整理的两本书得以出版——《太平天国时期的北京》（Пекин в дни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和《1689 ~ 1916 年间的俄中关系文件》（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 - 1916）。新版的《中国书目》也进展顺利。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于 1960 年出版，令学界叹为观止。可能学界开始时甚至不能充分认识这部著作对于学术进一步发展的真正意义。而 П. Е. 斯卡奇科夫则继续执著于编著《俄苏汉学家书目词典》，这个构想后来演变为《俄罗斯汉学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一书。正是这部著作,按着作者的构想,再现了俄国数十位汉学家的生活,再现了那些被生生剥夺了其在学术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权利的人的生命历程。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成绩被苏联汉学家视为俄国学术界的共同成就。他所出版的著作,能够激发起每个人的学术兴趣。另外,一些杂志和文集也经常登载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文章。他不倦地研究着档案和手稿资料,研究官方的和一些记叙性的原始材料,而刻苦钻研的结果,则是引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有价值的结论。

1962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隆重纪念 П. Е. 斯卡奇科夫七十诞辰,收到了很多热情诚挚的贺词。主要的学术杂志——《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亚非各民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都报道了这件大事,在《亚洲民族研究所通讯》的中国专刊上登载了 П. Е. 斯卡奇科夫小传和著作目录。七十大寿时 П. Е. 斯卡奇科夫不仅收获了以往研究的成果,还实现了一些新的构想。最主要的是他在比较短的时期里培养了后备人才。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密地将断裂的时间联接了起来,实现了俄国汉学几代人的传承。

在中国,П. Е. 斯卡奇科夫作为俄罗斯汉学家广为人知。1957年,中国历史学者张一东开始与斯卡奇科夫通信。“尊敬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同志”,张一东在1957年11月的信中写道,“首先向您祝贺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并向您问好!感谢您为我解答明万历皇帝的文书问题。我没能及时给您回信,因为我正在准备哲学考试。现在我已通过毕业考试,正准备答辩。真希望以后继续得到您的帮助”。同年12月,张一东说,他将于1958年1月底来莫斯科,要拜访 П. Е. 斯卡奇科夫。张一东的论文题目是《伟大的地理发现与中国》,其中的一章就是《俄罗斯与中国》,所以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意见对作者是十分珍贵的。

北京师范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迟宗海给 П. Е. 斯卡奇科夫写信,